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文学的历史使命

□杨 彬

中国民族文学创作发生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中国当代民族文学随着新中国的发展而一同成长。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作家坚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在具体创作实践中取得了突出成绩,其主要表现就是:当代民族文学始终把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放在首位,对各民族的书写都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进行,对各民族文化的展示都服务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各民族特色的呈现都是为了展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丰富多彩。

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文学作品,歌颂新中国、歌颂共产党、歌颂民族团结,其中已经包含了强烈的共同体意识。在对共同体意识的培养中,各民族作家成为新中国的红色作家,他们的革命意识、解放意识、国家认同意识、保家卫国意识、民族团结意识等共同体意识逐渐形成并根深蒂固,创作出一批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民族文学经典。

1950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明确提出普遍而又大量地培养各少数民族干部的方针。1954年,中国作协主席团第10次会议通过《关于召开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的初步意见》,特别强调吸收少数民族中的青年作者。1955年,玛拉沁夫提出中国作协应当发展少数民族会员,扶助各民族文学的发展。1956年,《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在《人民日报》和《文艺报》上刊发,提出包括“搜集、整理、翻译民族文学作品;吸收少数民族作家入会;出版少数民族作品;选拔少数民族青年作家至讲习所学习;成立少数民族分会;创办刊物”等在内的具体措施。1956年,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在北京召开,数十位少数民族作家参加了这次会议。中国作协还通过文学讲习所等机构对少数民族作家进行系统培养,如乌兰巴干在文讲所培训期间创作了长篇小说《草原烽火》。此外,国家大力扶持民族文化建设,在文化设施建设、文艺人才培养、对外文化交流、文物保护等方面对民族地区实行优先政策;加快发展民族教育文化事业,加强民族高等院校的建立和管理,普及中小学教育。这些措施共同推动了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培养和发展,大大提高了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热情,促进了多民族文学的繁荣,也开启了运用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培养少数民族作家的先河。当时的少数民族作家大多运用汉语创作,天然形成了各民族文学交往交流交融的关系,其作品内容大多描写党的民族政策在民族地区的实施,革命军队到民族地区进行民主

改革,各民族人民翻身解放、团结交往,少数民族参与建设新中国的功绩等,题材上鲜明地表现出共同体意识。

这一时期的民族文学作品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各民族在新中国成立后发生的历史性巨变,塑造了一大批具有鲜明民族性格的人物形象,体现出较高的思想艺术水平。玛拉沁夫《茫茫的草原》、陆地《美丽的南方》、李乔《欢笑的金沙江》等作品,展现了民族地区在新中国成立后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和民族新生活。《茫茫的草原》描绘内蒙古草原上的生活,《美丽的南方》反映广西壮族地区的社会变迁,两部作品分别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书写少数民族在革命斗争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对中华民族作出的贡献。民族诗歌也加入到民族团结大合唱之中,许多少数民族诗人通过他们的作品表达了对党和新中国的感恩之情,从社会主义建设角度切入建构作品的红色主题,展现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变化。当代民族文学创作始终保持与主流文学思潮同步推进的态势,为少数民族留下参与新中国建设的历史记忆,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时代以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民族文学创作的重要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各民族文学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自觉创作出一批优秀作品,在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以文学实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少数民族的历史题材文学作品,主要书写各民族在爱国主义推动下作出的历史贡献。爱国主义书写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特别是近现代,各族人民英勇无畏地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民族文学对此进行了热烈歌颂与生动描绘。比如贝铎三夫创作的《武陵王》,取材自中国近千年的土司历史,作品高扬民族团结和爱国主义旗帜,将武陵土司的命运放在整个中华民族的社会变革中进行审视,并融入文学意蕴和家国情怀。其中的《戍镇海疆》一章,写永顺、保靖、容美等土司响应国家召唤,远赴江浙抗击倭寇、保家卫国,立下“东南战功第一”的历史故事,体现了土家族人民忠于祖国、英勇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

少数民族的现实题材文学作品,立足各民族现实,展现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描写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现实图景,在书写脱贫攻坚、生态保护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土家族作家李传锋的长篇小说《白虎寨》描写年轻的土家人返乡后改变土家山寨落后面貌的故事。瑶族作家红日的《驻村笔记》

书写了扶贫工作队带领红山村村民脱贫攻坚的过程。哈萨克族作家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的《白水台》歌颂牧民们在新中国的新生活以及他们的爱国情怀。彝族作家阿克鸠射的《悬崖村》描写党的脱贫攻坚政策深入到悬崖村后,悬崖村藤梯变钢梯、整体脱贫的巨大变化,从中可以看到悬崖村的彝族人民脱贫奔小康的幸福和欣喜。

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获奖作品以其丰富的题材、深刻的主题和多样的艺术风格,展现了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体现了文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成就。这些获奖作品不仅展现了民族文学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也体现了各民族作家的创作实力和文学追求。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各民族的文化和生活,感受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力量。

维吾尔族作家阿舍的《阿娜河畔》以新疆的阿娜河畔为背景,讲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在这片干旱的土地上扎根、生活、奋斗的故事。作品通过独特的“万川归海”式结构,以丰盈的情感描写各民族一家亲的动人故事,歌颂各民族同心协力建设边疆的伟大历程。塔吉克族作家肉孜·古力巴依创作的《花儿永远这样红》以帕米尔高原的塔吉克族牧区为背景,与《冰山上的来客》主题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形成叙事张力,通过展现塔吉克族牧民生活的变化,深情颂扬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以及各族人民的无私互助,鲜明表现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特色。

新时代的民族文学,要自觉担当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各民族文化的“多元”是在中华文化“一体”前提下的,是“一体”中的“多元”,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各民族独特的文化特色,是中华文化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各民族作家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书写时代的发展变化与中华文化的繁荣进步,为传承弘扬中华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系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民族文学经典中红色文化传承研究”的子课题“民族文学经典中红色文化传承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评 论

带着巨大的热望朝向未来

——读朝颜散文集《父亲的大海和太阳》

□程 志

人们往往喜欢从记忆中搜寻自我成长的明证,又往往在找寻的过程中发现,自己是在某种“伤害”“疗愈”与“和解”中发现了成长的本质、亲情的意义和人性的幽微。这种体验在阅读畚族作家朝颜的最新散文集《父亲的大海和太阳》时,又再一次被强化和印证。

朝颜是一位很擅长对自我进行开掘的作家。就像她自己所说的:“故乡和童年是一个人的底色。”在这本散文集中,她的众多篇什再一次回应了自己所言,无论是记忆的连贯性还是情感的浓密度,都相对更胜从前。从朝颜的日常书写和故乡记忆中,依稀可见出她第一本散文集《天空下的麦菜岭》的身影。这种身影的存在,反映了作家生活半径的拓展和记忆圈层逐渐漾出的过程。这些都鲜明地展现在作家的生命履痕之中,各篇什共同以“生活着的作家”的形态,构成了她的言说内容和情感底色。

从散文集的内在结构来说,朝颜勾连生活、整拾记忆并于岁月流逝中阐明生活哲思的能力是很强的,这也是她能在散文创作道路上不断被人关注,并不断突破自我的关键所在。如果从作家的创作序序来看,《父亲的大海和太阳》可以说实现了一次重要的回望,或者说一次“心灵的重塑”。从《天空下的麦菜岭》出发,作家写的是个人的成长史、村庄史甚至家族史的部分记忆,而经历了《陪审员手记》《赣地风流》《古陂的舞者》三部非虚构作品的写作后,朝颜对于人的观察、对文化的探求和对人性的解剖已经更为纯熟而练达。《父亲的大海和太阳》似乎是作家对自我写作的一次巡礼,那些超越了写作能力和刻意经营的痕迹,早已化成作家内心最为深沉的爱与痛、最为矛盾的情与恨、最为真挚的不舍与回望。

读完这本散文集的时候,我的内心还是有些惊讶的。我以为她的“非遗系列”依旧会延续下去,《古陂的舞者》大有为赣南人民留下历史文化遗存的雄心壮志,且作为一个成熟的作家,朝颜正在开始向外

关注更为广阔的世界。本以为朝颜的下一部作品会更加“向外探求”一些,没成想她这一次笔锋一转,再一次对准了自己的日常、记忆和家庭,并进行更深层次的掘进。相对于初进写作时的文字而言,《父亲的大海和太阳》多了一份对生活的澄澈体悟,对家庭和亲情有了更为专属的写作温度,对人性也更多了一份宽容和理解。是的,她在经历了长途跋涉的生活后依旧选择热爱生活、拥抱希望,这一点无论是通过书中传递的态度和价值观,还是在书名上,都被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父亲的大海和太阳》所包含的元素就是“亲情”和“希望”,当然还有童年的记忆,以及根植于作家心底后又被作家重塑的生活形态。

《父亲的大海和太阳》通过18篇散文,很好地架构了作家对亲情、家庭和社会的理解,且呈现出更为成熟的思考。若能静下心来认真读完这本散文集,一定会生出一一种与我遥相呼应的感受:作家对时间的感知力是贯穿始终的,对家族史的记录是贯彻如初的,对亲情的探讨和本质性的追问是可以通过文字漫溢到读者的心灵的。我们不需要怀疑她对亲情的体悟对于公众的意义,也不需要质疑她坦承家庭就是“相互伤害的温情刺猬在一起拥抱的地方”,也无须过分去探查作家童年和家庭生活的幸与不幸。除个体经验外,人们还必须要认真对待散文广阔的社会性,即对作家呈现的家庭和日常生活予以一种更为拓展性的外延观照,并赋予其某种公众性的认同。

在《钝痛》中,我们明确认识到作家写的是母亲与女儿之间的“战争”,这本身是一个极具社会性的话题。母女主题的作品常受到社会关注,而作家竭力呈现出的“爱恨情仇”,难道不值得引起我们对家庭和亲情的议题展开思索和探究吗?我们承认它的私人性,但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相互温暖。家庭的温情是一个社会性问题,家庭作为社会最小的结构性单位,是容纳温情与爱的所在,是疗愈失意和伤痛的港湾。家给人们带来的是抚慰和栖

息,这样的“家”从某种意义上才真正符合人们所期待的“完满的精神结构”。从这个角度而言,朝颜所探讨的家庭温情和亲人之间的关系便具有了社会性意义。“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幸与不幸,亲情、家庭的矛盾与和解都将在社会性的维度中获得一种公共性讨论,这也意味着单向度的“唯一性”将被打破,并由此引发更多的共鸣。

尽管笔者认为这是朝颜的一次“自我回望”,是对家庭内部情感结构的一次深度开掘,但这并不意味着作家没有继续向外探索的意愿和笔调。作家在一些篇什中还是有将视角投向斜逸而出的广阔社会,这也就使得作品在写作主题上呈现出连续性。第一辑虽写家庭和亲情,但也同样透射出一种外溢的社会性,第二辑中的《剥离的生活》《飘萍》《过客》等文章则可见出作家对社会议题的关注。《剥离的生活》写的是赌博成风以致经济犯罪的问题;《飘萍》写的是外来女与本地人结婚后婚姻中的家庭责任问题;《过客》写的是离婚后的财产分割和爱何以破碎的问题……这些问题呈现出作家对社会观察的当代性和责任感。作家紧随时代发展,关注社会问题并提出思考,毋庸置疑,这是一个作家主体性也是其时代性的体现。

在《父亲的大海和太阳》中,无论作家叙写的是自我经验的“变形”,还是观察社会问题后的自我重塑与反思,最后我们都能从字里行间看出作家如同“大海与太阳”般的宽阔与温暖,她要留给人们的,更多的是希望。作家在洞察时光逆旅中的人性幽微时,始终在以合乎情理的笔调向人们阐述亲情、家庭之间最为重要的观念:这是“爱的堡垒”,不是“伤害的战场”。朝颜的文字始终是具象的,就是在一篇又一篇具象的文字之下,我们找到她理解生命、观察生活、阐释哲思的密码,带着巨大的热望朝向未来。

(作者系南昌大学人文学院特聘研究员)

■关 注

—

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文社科领域对人与动物关系的思考不断走向深化。有关动物的议题,已经涵盖哲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等多个学科范畴。在文学领域,动物文学研究已涵括古典时期到当代时期,从神话、寓言、童话到小说、诗歌、戏剧,从文本解读、理论建构到意义探寻,形成了一个独立而科学的理论体系。与国外研究的系统性与深入性相比,国内研究尚显单薄且起步较晚,并一度偏重于对西方文学文本的解读与文艺学理论方法建构。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文学动物叙事创作潮流涌现,围绕其所开展的相关研究也逐渐成为热点,发展至今已蔚为壮观的学术局面。

现有的动物叙事研究成果,往往聚焦人性、生态、神话、图腾等核心概念。近年来的相关研究多集中在生态批评的范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框架内展开,深入到对当代动物叙事生态伦理层面的考察。但这里一直相对忽视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向度,即民族与民族性的概念指涉。截至目前,只有少数文章站在民族文化视域开展相关研究,这一领域尚有极大的开掘空间。

在今天,保护动物物种多样性早已成为人类共识。在向原始民族学习与自然和谐共生经验的大趋势下,建构一个清晰醒目的民族动物志图谱,理应成为动物叙事研究的核心要义。对于一个古老而后发的多民族现代国家而言,众多的民族书写样貌与各具风格的语言艺术,是极其宝贵的叙事资源。如何立足民族本位,在全球性视野中彰显本土特色动物叙事的话语优势,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即是将动物叙事创作上升到民族志和时代志的高度,聚焦民族、民间的文化心理内部,探寻民族动物叙事的发生发展及其所蕴含的集体心理原型,实现深层次的文化意义与思想内涵的拓展发掘。

二

通过溯源不难发现,在广袤富饶的中华大地上,动物与人共同生活在一片天空之下,彼此间的紧密关联可谓源远流长。有关动物的书写无疑是各民族古老厚重的叙事传统,其中凝聚着人类集体无意识的经验积累与智慧结晶,几乎贯穿了各民族起源、进化与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虽然其具体表征方式、叙述形态与情感诉求不尽相同,但无疑都共同指涉着动物与民族、与自然之休戚相关的一切内在关系。在少数民族的整体文化视野中,动物自始至终以一种图腾表达的方式寄托着被守护与庇佑的情感诉求,调节着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动人们将保护自然、回馈自然作为集体意识和行为准则,力求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中,获得生生不息的力量。可以说,动物神灵的历史本身即是人类历史的一个侧面,反映出动物与人相互依存的关系。万物有灵、动物崇拜等原始情感基质则横亘在各民族群众的情感意识深处,影响着他们对人与动物、人与自然关系的最基本的理解与判定。

对此,卡西尔曾经有过经典的论断:“原始人绝不缺乏把握事物的经验区别的能力,但是在他们关于自然与生命的概念中,所有这些区别都被一种更强烈的情感湮没了:他深深相信,有一种基本的不可磨灭的生命一体化沟通了多种多样的个别生命形式。……所有生命形式都有亲族关系似乎是神话思维的一个普遍预设。”在原始人的情感认同中,动植物与人类一样拥有生命与“灵魂”,应该被作为生命主体来对待。正是依托“生命一体化”所带来的均衡的力量,人与自然之间积极、正态的关系才得以被有效调节,并确保了人类能够在极其艰苦的自然环境下安之若素。时至今日,这种观念依然深刻影响着各民族人民与动物之间关系的判定,他们选择与动物共栖共存,以期实现人与自然的沟通与和谐。

图腾文化是世界范围内的民族或部落在一定历史阶段上普遍存在过的文化现象,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或多或少都保留了动物图腾文化,比如鄂温克、鄂伦春族崇拜熊、鹿,蒙古族以狼、鹿等为图腾,土家族崇拜白虎,回族与马的关系紧密等。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深深根植于民间土壤,具有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透过他们笔下的动物书写,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品性与情感内核。

正如蒙古族作家海勒根那所言:“血脉里流淌的游牧祖先的基因冥冥中被辽阔无边的风唤醒。在这里,我似乎找到了灵魂的归宿,找到了文学创作的神性和源泉。”民族文化之根已经深植在少数民族作家们的灵魂深处,成为他们展现民族地域文化、书写动人生命视域的永恒源泉。他们以其特有的动物叙事,在与读者期待视野的双向互动中,呈现出本民族的某些



民族文学动物叙事:

一个亟待开掘的话语空间

□陈佳冀

思维观念和形成于特定文学形式中的独特审美范式。特别是在“民族—生态—动物”这三维紧密关联的伦理视域中,通过作为人的思想意识侧面的动物叙事,反映民族精神风貌与品格,从而加深我们对民族文化心理的认知。在藏族作家次仁罗布的《放生羊》中,羊与老人之间形成牢固而默契的情感联盟,彼此相互守望,共同经历生命的救赎;在蒙古族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动物叙事中,动物的生命运得到最为原生态的展示,作者将动物还原于自然界,以忧伤深沉的笔调书写动物故事;回族作家石舒清通过《清水里的刀子》《失踪的羊》等系列创作,以生动扎实的西海固书写展现中华文化多元包容的特质,为当代文学注入新的活力与生机;而在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笔下,诸如熊、鹿、马、猎犬、鸟、狼等诸多具有鲜活生命质地的动物意象被置于民族文化与生态保护视域之内,成为反观人类自身、彰显民族特性、呼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象征符号,具备突出的叙事张力与丰富的意旨空间。

三

进入21世纪,民族文学始终站在时代前沿,紧跟社会发展步伐,对诸多重要命题作出强有力的回应,不断书写着极富时代内涵的“新故事”。动物叙事作为当代民族文学中颇为重要的写作类型,其叙事范畴早已由生存主体(个人)的生命内涵拓展至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和伦理,涵盖生态、族群、民族、家园、文明等重要概念。民族视域作为方法论,应当始终成为我们在对动物叙事作出有效阐发时的一个核心向度,包括对具体叙述手法的本土化探究,兼及修辞策略、情节模式、结构铺陈等维度(如对中国古典小说中常见写作技法与创作元素的吸收),在类型学视野中依托具体文本进行共时性考察,进而归纳和提炼民族文学动物叙事的主导叙述品格。

鲁迅曾谈到,“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凸显出民族书写与地方色彩的重要意义。土家族作家李传锋借动物叙事实现对鄂西南人民生活习俗与生存样貌的精彩描摹;仡佬族作家赵剑平执着于黔北农村当代生活与古老民俗传统的贯通书写;在蒙古族作家郭雪波笔下,科尔沁草原的生态状况与地方风俗成为其重点观照的写作对象;处于华夏腹地、人文底蕴深厚的秦岭,则成为满族作家叶广岑动物叙事源源不断的叙事资源;无边的呼伦贝尔草原和广袤的大兴安岭原始森林,与格日勒其木格·黑鹤永远联结在一起,成为其情感与血脉的延伸。作家们的书写,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视域,即从文化自觉与民族原生态书写的维度出发,阐发民族文学动物叙事创作者如何通过原生态的叙述,实现对民族地域风格与民俗风情的展示,同时直面全球性的环境危机与生态主题,彰显中国式动物书写的独特经验与世界性贡献,其必将对传承弘扬民族精神、繁荣发展民族文化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作者系江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主任,本文系2023年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小说动物叙事的话语范式研究(23ZWB007)”的阶段性成果]